

华侨华人社会适应内在机理探析

林龙飞

An Analysis on Intrinsic Mechanism of Social Adapt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Lin Longfei

[Abstract]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s one kind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t has its own operational mechanism, which includes social adaptation possibility, process, effectors, related parameters and results. The real possibility of social adapt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s decided by open human gene system, cultural acquisition and social life regularizat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social association.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s divided into psychological gradation and behavioral gradation and is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 factors, family members and social relation people, social background of 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and three obstructions which result from cultural contrast,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symbols and ethnic differences. The effective parameters ar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emphatic capacity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results in adaptation and non-adaptation.

社会适应,主要是指人生的特殊时期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后,通过对自身的心理和言行进行调整,培养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以便为主流社会所接纳的过程。

华侨华人的社会适应是一种国际移民的社会适应,是在完全不同甚至完全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新环境的适应。内容涉及:缓解华侨华人新移民所经历的文化休克;改善其心理适应和增加满意度;提高其在新文化环境中的行为能力。适应的目标是华侨华人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增强,体现在对移居国社会文化模式的认知、选择和接受能力的提升,与移居国主流社会交往能力的提高。

一、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可能性理论分析

(一) 文化习得

文化,即文明,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概念,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里的文化,是指区域文化,是指特定人类群体的行为和认知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

精神和物质生活。霍尔认为,文化有三个基本属性:1.习得性。文化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习得的。2.互联性。文化的各种成分是相互关联的。3.共享性。文化由群体成员共同分享,并由此划分出不同文化的疆界。文化的习得性特点,表明文化对于人类个体来说并非先验的存在,而是需要在后天的文化环境中通过教育和环境潜移默化的熏陶而逐渐内化于个体。

(二) 社会生活秩序化

奥尔森指出,社会结构的存在需要某种程度的秩序化,社会生活的秩序化包涵个体、社会和文化3个层面。个体秩序化是指使个体的认知、情感等内在心理过程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个体在自身秩序化过程中通过对自己的情感、态度和需要进行整合,使之成为连贯的整体——人格。社会秩序化是在两个以上的个体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出现的,社会交往的延续使社会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博士生、湘潭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

E.T.Hall, *Beyond Culture*.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Doubleday, 1976.

关系得以建立。居住在某一地区的人们经过不断交往会形成带有模式特征的行为,同时特定群体对于如何阐释周围世界也逐渐达成共识,并产生出一套可以共同分享的象征意义的体系,这就是文化观念。

文化的特性和社会生活的秩序化决定了华侨华人移居居住国后,能够通过学习,在新社会文化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熏陶,对自身进行调适,以使自己能融入移居国的社会环境文化。这是一次全新的文化习得和社会化过程。

(三)符号互动与社会交往

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离不开符号媒介,正如卡西尔所言,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如语言、神话、艺术和科学,都是人类符号活动的结果,所有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也都是运用符号形式来表示人类的种种经验。卡西尔指出,人类智力始于概念作用,而概念只有在它体现为符号时才固定下来而让人把握。怀特也指出,文化是象征的总和,是一个自觉的和自我本位的进化过程,此过程来源于人类创造和运用象征符号的能力。由此可见,人类作为社会存在,其相互交往是建立在符号及其共享意义的基础之上的。人类对符号不仅能够作出反应,而且能够加以解释。人类正是通过阐释活动建构起社会现实,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习得了符号及其意义,并根据对情境的理解而调整或改变他们所使用的符号和意义。人能够通过反省其自身经历而对自己的行动和感觉作出评价并且有意识地进行改变。

华侨华人移居国外后,人格自我面对全新的文化语境时,其与环境交互作用的机制仍会发生作用。并且在习得新的文化模式的同时,通过符号互动(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人格自我的形态也会发生改变,以便能和居住国国民更好地交流和交往。

基于以上3种理论,华侨华人移居国外后,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主动进行调适,逐步融入居住国社会,适应居住国社会。

二、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过程

华侨华人社会适应包括心理适应和行为适应两个层面。

(一)心理过程

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心理过程,即认知和情感的转变过程。不同文化在思维方式和认知风格上存在差异,例如中国文化更倾向整体型,西方文化更倾向于分析型。华侨华人在接触移居国文化的开始阶段,常因移居国人心难测,而倍感孤独无助。在适应的开始

阶段,华侨华人对移居国社会的认识往往是简单的;习惯使用定型观念来思考问题,缺少与移居国民众有效沟通的语义定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侨华人对居住国的社会文化认知系统的理解会逐渐增强,并通过母文化的比照而拓展认知广度。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其认知结构也发生变化,体现在分辨、整合能力的增强、认知准确度、复杂度以及获取信息能力的提高。同时,华侨华人对居住国社会文化适应也体现在情感方式如情绪定位、审美、动机、态度等方面。审美知觉和审美观念涉及某些难以言表的、直觉的感受,包括尊重、喜悦和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在移居初期,华侨华人因为缺少母文化所熟悉的审美符号,而又对居住国文化的审美符号及意义缺乏了解,审美需要常常难以满足,加上由认知的不确定感而导致的焦虑,华侨华人常常经历情绪危机。伴随着对居住国社会交往的增加,华侨华人对居住国家文化的符号意义愈加了解和熟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认同和接受其审美和情感表达的方式,从而逐步进入角色,心理上开始将自己当作居住国的一员,学会使用当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处理日常事务。

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心理过程是个体以自身的各种心理资源组成的自我系统与各种刺激因素组成的社会情境系统交互作用的过程。华侨华人从自我的自在状态进入一个需要与之交互作用的社会情境系统,并最终达成社会适应状态,至少要经历4个环节:1.起始比较环节。华侨华人进入新的社会环境后,往往通过比较评估,得出是否具有自身优势的结论。有优势,就会产生理解与控制感;是劣势,就会产生无助和失控感。2.心理发动环节。华侨华人面对新的社会情境,通过与周围情境的比较,产生某种程度的心理控制感后,就进入了对潜在的心理能量的发动环节。对所处社会情景具有自信心的人肯定能够积极地调动自身的资源,从而有效地应对外在的压力。3.内容操作环节。在华侨华人与社会情境起始比较而产生心理优势感的基础上,通过对自身应对资源的有效发动后,华侨华人的社会适应就进入了如何采取适当的应

M.Olsen, *The Proces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239页。

L.E.Anderson, *A New Look at An Old Construct: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4, 18, p.293-328.

对策略,有效地应对外在压力的行动阶段,即进入了所谓的内容操作环节。4.适应评价环节。华侨华人经过以上社会适应环节后,对适应结果进行评估,决定是否继续保持与特定适应领域的交互作用,或者退出社会适应进程。

(二) 行为过程

克服了心理障碍以后,在认知和情感适应的基础上,华侨华人社会适应最终体现于行为的适应。社会适应的行为能力主要有两种:一是技术能力,二是社交能力。技术能力指一些基本和实际的能力,如语言、工作、学术等方面的技能,它们是个体承担某一特定社会角色所必需的。社交能力包括与人交谈、适应居住国主流社会的行为方式、建立人际关系网络和解决冲突的能力。华侨华人经过失败和锻炼,经过认知和情感定位的不断学习和积累,其行为能力的得体性和有效性逐步累积。他们开始不再需要刻意制定行动计划,而能自动地表现出适合居住国社会角色的行为。

伴随着对移居国民众情绪的准确理解和移情能力的提高,华侨华人面临不确定情境的应变能力也随之增强。行为适应具体表现在社会角色和人际交往两方面,即能够根据环境的需要自如地担任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同时能够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顺利地交往并建立更加密切的人际关系。经过心理和行为的适应,华侨华人终于可以破茧而出,在社会交往中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成功人士了。

三、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与障碍

影响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因素很多,大致可分为:华侨华人的个体因素、家庭和其他社会关系因素、移出地和移入地社会因素等。个体因素是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自变量;而家庭和社会关系因素、移出地和移入地社会因素则是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因变量。因变量通过自变量起作用,两者共同影响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进程及其结果。

个体因素包括年龄、性别、语言、受教育程度、心理素质及其人格等方面。就华侨华人年龄而言,移居时年龄越小,社会适应越容易,年龄越大,社会适应的困难越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年龄越小,文化的同一性越弱,其母国文化经验越少,与母国文化相联系的价值观、信念和习惯的植入越浅,更乐意且更容易接受新社会的文化;相反,年龄较大的移民则更倾向于保持或维护其母国文化,而对异质文化持排斥态度,这无疑会影响他们社会适应的进程。就华侨华人

性别因素而言,早期华人移民女性数量少,她们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机会少,社会适应难度更大。现代移民社会适应的性别差异则日趋缩小,甚至因为女性在语言学习方面的天赋和某些职业的女性优势而表现出女性社会适应方面的优势。就华侨华人语言而言,语言技能在移民适应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不熟悉移居国语言的人,往往更易陷入抑郁和其它精神障碍中,从而表现出低水平的社会适应;相反,熟悉移居国语言的人,往往能较快了解移居国文化,容易与他人沟通,在异国他乡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网络,较快适应当地社会。就华侨华人受教育程度而言,无疑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移居国的社会文化越了解,越容易理解移居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与他人沟通和交际更加便捷,社会适应越容易。华侨华人心理素质(包括态度和个性)也对社会适应有重要影响。有利于适应的态度包括:知识定向(认识到别人拥有比自己更有价值的知识),有对新文化的正面态度和愿意远离母国文化的意向,有一个无偏见的态度和文化移情(以他人的文化视角看问题的能力)。有利于适应的个性因素包括:忍耐力(耐性)、容忍力、压力应对能力、持续的人格弹性、自信、健康的自尊。不利于适应的个性因素包括:完美主义、刻板、教条主义、民族优越感等。人格是一种特定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系统,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不同文化背景决定的人格特征和价值取向。不同社会人格无疑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适应结果:稳健内敛的文化人格必然衍生消极的社会适应行为;进取外向的文化人格则多产生积极的社会适应行为。

华侨华人其他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人也会影响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方式和进程。国外有人归纳总结出移民的4种社会适应方式:一是同化,即高度参与和接受异地新文化,同时拒绝自己的本土文化;二是融合,即高度参与和接受异地文化,同时也维持自己的本土文化;三是分离,即参与、接受异地文化与维护自己的本土文化相分离;四是排斥,即低参与和接受异地文化,同时也抛弃自己本土文化。很显然,华侨华人家庭和其他社会关系人的分离和排斥适应方式是不利于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华侨华人家庭和其他社会关系人的同化和融合适应方式有利于华侨华人社会适应。华侨华人在移居国有“关系”可资利用,无疑也会促进他们的社会适应。“关系将影响迁移者的适应度”这是一条不用证明的公理。在社会学界,“关系”一般分为4种类型:无关系、亲关系、友关系、公关系。迁移者在“异国”的关系是决定其适应进程的重

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先前移居当地的同胞也是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重要“关系”资源。他们可以提供相关信息,帮助华侨华人应对新的环境;同胞还可以提供情感帮助,支持他们宣泄和释放自己的情感,克服在新的环境中遇到的挫折;同胞可以提供保护作用,使其心理安全、自我尊重和归属感得到增加,减少压力、焦虑、无助感和疏远感。但是,这些社会支持也可能阻碍华侨华人新移民对当地文化的学习。移居国其他族群的朋友也是华侨华人社会适应十分有用的“关系”资源。华侨华人与其他群体成员的关系,特别是与当地主流社会成员的关系,也会影响他们的适应。有当地朋友的华侨华人适应问题比较少,满意度与心理幸福感比较高。

移出地和移入地的社会因素中,对华侨华人社会适应影响最大的有3个方面:中国和移居国社会文化反差的大小,移入地国家对华侨华人移民的态度,移居国社会组织尤其是华侨华人组织的作用。首先,中国和移居国文化差异影响华侨华人社会适应。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中国文化与居住国文化的相似之处越多,不相似之处越少就越容易适应。研究发现,华侨华人在佛教文化国家和基督教文化国家要比在伊斯兰文化国家更容易适应,原因在于文化的共同点更多。这似乎印证了亨廷顿对伊斯兰教的评价:“穆斯林的不相容,它把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将信仰伊斯兰教者和非信仰者明确区分开来。其结果是佛教徒、印度徒、基督徒彼此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较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与穆斯林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要更为容易。例如,华人已成功地融入了信仰佛教的泰国和信奉基督教的菲律宾,但在马来西亚和印尼发生了反华活动,非常敏感”。其次,移入地国家对华侨华人的态度及移民政策也对华侨华人社会适应产生重要影响。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移入国的国民对华侨华人移民的态度有所不同。这种态度或是非常欢迎,或是在政策、法律上歧视,或是攻击移民。不同的态度和移民政策,直接导致不同的社会适应结果。如二战后,在欧美国家和澳洲,华侨华人社会适应越来越容易,华侨华人迅速增加;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适应越来越难,移居者数量不断减少,甚至出现许多华侨华人从东南亚移出的“二次移民”。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华侨华人的态度和移民政策不同,欧美国家和澳洲移民政策越来越宽松,而东南亚国家在建立民族国家后移民政策趋紧,限制越来越严。第三,华侨华人社会组织在整合华侨华人社会内部关系、协调华人族群与居住国大社会的关系、

提升华侨华人社会适应能力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助推器和减压阀。

对于华侨华人而言,社会适应主要有3种障碍:中国文化与移居国文化的反差带来的文化冲突;语言及非语言符号造成的交流障碍;种族差异带来的社会交往的鸿沟。安德森指出,移民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需要对付3种障碍:1.己文化与异文化在价值观、态度和信念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冲突;2.在己文化中所熟悉的界定身份的符号信息的丧失;3.在新环境中由于感知灵敏度和行为灵活性降低而造成的社交能力的减弱。

华侨华人中很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早期华侨移居他国,多不作长期定居的打算,多抱着“出国淘金、富贵还乡、光宗耀祖”的想法,即使不能一夜暴富早日回家,到老也要“落叶归根”。他们在居住国多只关心经济问题,不问政治,也不关心社会生活。这种价值观对华侨华人社会适应有较大影响,这严重限制了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主动性和热情。二战后,特别是近年来华侨华人价值观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主观心理障碍克服后,社会适应的进程大大加快。

华侨华人移居外国后,首先会在使用语言和非语言符号进行交流时遇到障碍。首先,汉语普通话是一种独特的文字语言体系,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的拼音文字截然不同。其次,不同语言在词汇、句法、习语和方言等方面存在差异,由于语言与文化之间具有内在关联,对语义的准确解读需要有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经历作为条件,华侨华人即使移民前作过语言的准备,但对初来乍到的华侨华人来说,准确把握移居国语言仍是十分困难的。他们通常只能对移居国的语言语义作简单化的理解,而不能把握其中诸多的隐含和象征意义,因而难免发生误解。第三,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相比,往往是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更大障碍,因为非语言信号作为个体行为的感知系统,其解释的依据更多地存在于特定文化的语境之中。

华侨华人与移居国主体民族的种族差异也是华

赵定东、许红波:《“关系”的魅力与移民的“社会适应”:中哈移民的一个考察》,《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年第4期,第22-28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L.E.Anderson, A New Look at An Old Construct: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4, 18, p.293-328.

侨华人社会适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欧美国家，“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曾盛极一时，当时，华侨华人的肤色和体质特征，成为他们受排斥、打击和限制的“理由”，根本无法融入和适应当地社会。早在19世纪40年代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白人认定他们在“精神上、体魄上和智力上”都比称之为“劣等民族”的有色人种优越和高贵。白人对有色人种持居高临下的鄙视态度，不屑与之共处于同一社会。

由于存在以上障碍，有的华侨华人会感到被疏远，感到自身能力不足以应付环境的需要，而随之出现紧张和焦虑。于是有人把自己禁锢在“唐人街”；有人自我封闭，不与他人交往，老死不相往来；也有人干脆退出在当地的社会适应过程，离开移居国，回到中国，导致社会不适应。

四、华侨华人社会有效适应参数

在华侨华人社会适应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状态，如动机、态度、人格开放度及移情能力等，都会影响适应的有效性和进程。在思想动机和心理倾向上是否愿意与新环境交流，会影响其对信息反应的敏感度、行动的持久性和对交流障碍的耐受能力。人格开放度指的是一种接受新信息的内在倾向，它使华侨华人在与新环境交流的过程中减少抵触，增加对新信息的关注，并使其能够采取尊重事实的解释方式，而不是简单地从某种教条和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作判断。华侨华人对文化差异持宽容态度，愿意面对并经历一些不确定感，也是有效进行跨文化适应所必需的。对陌生情况的耐受能力也会影响华侨华人对交流信息的关注和解读，在缺乏耐受未知能力的情况下，华侨华人往往根据不成熟的第一印象作出判断，而不能用客观的眼光正确解读环境信息。此外，移情能力也是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重要参数。移情能力指能够充分了解对方的立场和感受，体会对方的需要，在思想上与他人取得认同。要充分达到移情并非易事，需要他们深入到文化内在结构之中，通过亲身参与，与居住国社会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在了解对方的同时对己文化也加以反思，才能透过文化的表层，把握其隐蔽的精神实质。

如前所述，华侨华人社会适应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基因编码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个体与异文化环境之间经由符号互动，其内在自我得以重构。由此可见，华侨华人与移居国社会文化的交流至关重要。通过交流，他们可以获取关于移居国社会的直接而具体的信息，从而为自身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找到参照。随着交流的深入，华侨华人有可能与移居国主流

社会逐步建立起亲密的人际关系，从而在移居国社会环境中获得社会支持，并且有助于处理压力和减轻焦虑。除了人际交往的途径以外，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的交流也可以借助于大众传播的方式进行。与人际交往相比，大众传播虽然较少能有面对面的直接沟通和反馈，但对于华侨华人来说，尤其在适应的最初阶段，仍然是跨文化学习的重要途径。

五、华侨华人社会适应的结果

华侨华人社会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发展趋向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联系的紧密程度、移居时间、移民动机、态度和学习等。在适应的成熟阶段，华侨华人对移居国社会文化的敏感度和接受度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从而能够尊重和包容当地文化的正面和负面成分，自如地应付压力和控制焦虑，社交的放松度和满足感也随之提高。自主能力的充分发展，使华侨华人能够用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评价文化差异，对已有的和新近接受的文化信息进行整合，使个体人格呈现双重文化的特点。这时个体的成长已经超越了原文化的周界，其自我理念和文化身份已经从原来固定单一的模式发展成为扩大了、更具弹性的新模式。阿德勒认为，这种跨文化身份的基础不是“归属”，它与文化的关系不是占有和被占有，而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个体既不是完全作为特定文化的一部分，也不是完全与之分离，从而能以一种自主和独立的、类似“第三者”的眼光看待世界。也就是说，社会适应是一种文化的整合。

社会适应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是一种自我人格的再社会化。华侨华人经过适当的互动过程，其适应结果可以作3种水平的评估，第一种水平是个体调控或改变适应情境，实现自我和组织的目标，从而达到和谐状态，即所谓的最佳适应状态；第二种水平是个体改变自身，顺应适应情境，从而进入和谐平衡状态，即所谓的比较适应状态；第三种水平是个体既不能顺应环境，也无法调控和改变环境，从而使自己与环境处于相互排斥、相互孤立的非和谐状态，即所谓的非适应状态。前两种情况称之为社会适应，形成整合人格；第三种情况称之为社会不适应，形成边缘人格，表现为不为社会或主流社会所接纳，被社会边缘化，被孤立。

P.S.Adler, *Beyond Cultural Identity: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and Multicultural Man*, In L.Samovar and R.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 (2nded), Belmont, CA: Wadsworth, 1976, p.391.